

玛利亚·凯卡, 宋岩, 陈崇贤. “请别再叫我有韧性”: 联合国人居署的《新城市议程》充当免疫角色 [J]. 风景园林, 2020, 27 (5): 52-58.

“请别再叫我有韧性”: 联合国人居署的《新城市议程》充当免疫角色

“Don't Call Me Resilient Again!": The UN Habitat *New Urban Agenda* as Immunology

著: (希腊) 玛利亚·凯卡 译: 宋岩 校: 陈崇贤

Author: (GRC) Maria Kaika Translator: SONG Yan Proofreader: CHEN Chongxian

开放科学 (资源服务)
标识码 (OSID)



中图分类号: TU984.11+5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673-1530(2020)05-0052-07

DOI: 10.14085/j.fjyl.2020.05.0052.07

收稿日期: 2019-11-07

修回日期: 2020-03-13

作者简介 (Author):

(希腊) 玛利亚·凯卡 / 女 / 博士 / 阿姆斯特丹大学城市、区域及环境规划教授 / 荷兰皇家艺术与科学学院 (KNAW) 高级研究院 (NIAS) 2019/20 年度资深会员 / 研究方向为 3 个相互关联的主题: 城市政治生态、城市危机和土地金融化、城市的激进想象
(GRC) Maria Kaika, D.Phil (Oxon), is the Professor of Urban, Regional and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nd 2019/20 fellow of the Royal Netherlands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KNAW)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NIAS). Her research focuses on three interrelated themes: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cities crisis and land financialization, and urban radical imaginaries.

译者简介 (Translator):

宋岩 / 男 /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 研究方向为城市生物多样性设计及城市新陈代谢评价
SONG Yan is a Ph.D. candidate at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urban biodiversity design and urban metabolism assessment.

校者简介 (Proofreader):

陈崇贤 / 男 / 博士 / 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 本刊特约编辑 / 研究方向为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与理论
CHEN Chongxian, Ph.D.,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 supervisor in the School of Forestry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nd a contributing editor of this journal.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landscape planning, design and theory.

摘要: 第三届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 (人居三大会) 的《新城市议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范式转变”。但是, 对“安全、韧性、可持续和包容城市”的新呼吁仍然依赖指标等旧方法论工具、智慧城市等技术管理解决方案和无效的生态现代化范式的体制框架。在这个旧框架内追求新的城市范式只能起到类似免疫的作用: 它为公民和环境接种“疫苗”, 以便他们将来可以承受更大的不平等和退化风险; 它参与解决全球社会—环境不平等, 但收效甚微。诚然, 现在全世界越来越多的社区拒绝接受这些免疫学方法。相反, 他们打破了路径依赖性, 并建立了获得住房、医疗保健及卫生设施等的有效替代方法。真正的智能解决方案和真正的社会革新不在建立共识的行为中, 而在这些持异议的做法中, 它是能够反映什么问题才是迫切需要被解决的活指标。

关键词: 冲突; 分歧; 人居三大会; 包容性; 指标; 《新城市议程》; 政治生态; 韧性; 安全; 智慧城市; 社会创新; 可持续;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基金项目: 欧盟第七研发框架计划“玛丽·居里行动计划” (ENTITLE, 编号 289374)

Abstract: The Habitat III Conference's *New Urban Agenda* hails a “paradigm shift” for pursu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However, the new call for “safe, resilient,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cities” remains path dependent on old methodological tools (e.g. indicators), techno-managerial solutions (e.g. smart citie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of an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paradigm that did not work. Pursuing a new urban paradigm within this old framework can only act as immunology: it vaccinates citizens and environments so that they can take larger doses of inequality and degradation in the future; it mediates the effects of global socio-environmental inequality, but does little towards alleviating it. Indeed,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ommunities across the world now decline these immunological offers. Instead, they rupture path dependency and establish effective alternative methods for accessing housing, healthcare, sanitation, etc. I argue that real smart solutions and real social innovation are to be found not in consensus-building exercises, but in these dissensus practices that act as living indicators of what/where urgently needs to be addressed.

Keywords: conflict; dissensus; Habitat III; inclusiveness; indicators; *New Urban Agenda*; political ecology; resilience; safety; smart city; social innovation; sustainabili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11

Fund Item: The European Union's Seventh Framework Programme “Marie Curie Actions” (ENTITLE, No. 289374)

1 量化的绿色: 指标与智能技术是生态现代化前景不断受挫的象征

2016 年 5 月, 荷兰环保组织荷兰地球之友 (Milieudefensie) 报告称, 阿姆斯特丹、马斯特里赫特 (Maastricht) 及鹿特丹部分地区糟糕的空气质量已违反欧盟标准, 达到了使公民面临危

险的污染水平^[1]。一个月后, 报纸发布了一篇有关智能技术新案例“树 WiFi” (TreeWiFi) 的文章: 介绍了一种可对空气污染作出反应的鸟屋, 当空气质量较好的时候, 它可以发出绿光并为路人提供免费 WiFi。荷兰设计师及发明家约里斯·拉姆 (Joris Lam) 表示, 他的愿望是“寻找

一种简单的方法将空气污染可视化，以便市民在主观情感层面就可以理解，而不必采用挖掘数据和地图的方式”^[9]。然而，这篇以“树Wifi”为主题的报纸文章所期望的却远不止是情感层面的理解，正如标题《“智能”鸟屋可以帮助改善阿姆斯特丹的空气质量吗？》的问句所暗示的，这个设计也许是一种解决空气污染的方法。

媒体及政策制定者喜欢智慧城市及智能技术。这些技术收集数据并将其输入环境监测框架，使得关于可持续指标的报告变得更容易，且已成为我们所承诺的生态现代化前景的象征。而这个前景即通过永久提升技术智能性以及不断监测和改进我们的可持续性报告及指标，最终抵消我们对全球社会—环境造成的破坏。例如，《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对“（可）向框架报告的最低数据”有严格要求^[9]。这意味着，要变得足够“智慧”以便可以在地方及国家层面进行收集、输入及验证数据，这已经是各国成为这种发展框架一部分的先决条件。私人倡议也遵循着同样的逻辑。IBM“智慧城市大挑战”（IBM Smart Cities Challenge Programme）将“控制环境”的需求等同于“进行（相关）信息的系统收集”的需求，并将“加强协作能力”的目标转化为优先“构建用于信息和数据获取的通用设备”^[9]。

数字及指标量化的绿化体系，或者说将社会—环境问题转化为“智能”监测和基础设施的技术^[9]，意味着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追求与对智能城市的追求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将智能技术管理系统视为解决全球社会环境问题的灵丹妙药，对于可持续性框架的追求与对智能技术、智慧城市的追求之间产生了一种直接的路径依赖（且相互依赖）的关系。

当可持续指标无法实现进一步改善时，则推动了新智能技术或治理技术的开发，其有望弥补我们的损失。但这是一个屡屡无法实现且屡屡受挫的承诺。遵循可持续发展研究及政策议程的人都十分了解，智慧城市并不等同于可持续城市。对于那篇报纸文章中提出的问题

“‘智能’鸟屋可以帮助改善阿姆斯特丹的空气质量吗？”，最简单而直接的回答是不可以。智能鸟屋（或者其他任何智能技术）无法改善阿姆斯特丹（或其他任何城市）的空气质量。

事实上，智慧城市和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不可能成为解决方案，是因为它们本身是问题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追踪智能技术的整个社会—环境循环，我们就能更好地了解这些技术真正的“可持续性”。例如，钶钽铁矿（钶铁矿—钽铁矿的复合铁矿）是所有移动通信电路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金属矿石价格约为0.4万~2万人民币/kg（600~3000美元/kg）。然而，全球超过18%的钶钽铁矿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且是手工开采的。联合国一再报道说这类开采是对当地环境及人民的高度组织化剥削^[9]。那些有能力变得“更智慧”的城市的可持续性却直接依赖于对世界其他地区环境及生计的破坏，而这只是众多案例之一。

但是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智能技术的整个社会—环境循环。现如今我们开始评估数十年来政策框架及治理实践的整个社会—环境循环，它们都是通过可持续性指标及“智能”监测技术追求“绿色”发展议程^[9]。现有证据充分表明，“绿色”发展议程正推动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出现新形式的流离失所及“环境/生态士绅化”^[7-9]。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2015—2016年度关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移民劳工状况的报告。该报告对阿布扎比（Abu Dhabi）后城市化典范马斯达尔（Masdar）“生态城市”的“可持续性”资质提出不同意见^[10]。马斯达尔的建成被誉为生态现代化王冠上的宝石，然而这颗宝石却依赖于在其他地方近乎奴役的劳动条件下开采矿产资源，并且雇佣移民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地劳工不能接受的工地环境工作，他们工资过低且往往没有保险^[11]。同样，印度总理莫迪将智慧城市推广为印度的发展引擎的计划也产生了令人质疑的社会—环境结果。这充其量是一种“企业家城市化”的形式^[12]，却未能制定出一套综合性的替代政策来解决众多问题，包括与该国殖民历史相关的问题^[13-15]。这

些言论通常被誉为可以促成彻底变革，但它们却不会真正改变任何情形。

然而，通过指标框架及智能技术追求可持续发展而导致的不良结果并不局限在发展中国家。Greenberg记录了著名的“生态乌托邦”（ecotopian）旧金山湾区如何使其可持续发展指数上升，同时又成为美国最昂贵且不平等的地区之一^[16-18]。Heynen等^[19]通过将密尔沃基（Milwaukee）城市树木的空间分布不均与种族的空间数据联系在一起，展示了数字和指标量化的绿化在社会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因此，总的来说，通过追求“更智能”的检测技术及更好的绩效指标，使我们在应对解决全球社会—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影响时变得更加游刃有余^[20]。但是，我们仍在继续追求发展更加智慧的城市发展及更复杂的指标设计，仿佛这本身就会对全球生计及环境产生积极影响。我们一直将自然视为一种通过公园、屋顶绿化等形式可以注入城市中的事物，一种可以在城市中种植以提高可持续性并带来和谐生活的具有美感的人工制品（就像智能技术一样）^[21]。我们一直将“智慧”城市与“可持续”或“公平”城市等同起来。

《新城市议程》（*The New Urban Agenda*）就是一个例子。在《新城市议程》正式发布前的预备文件中就已存在将智慧城市等同于可持续城市或者公平城市的逻辑。其中之一是2015年联合国智能可持续城市焦点小组（United Nations' Focus Group on Smart Sustainable Cities, FG-SSC）的报告^[1]。该报告指出了“一个公认的真理，即拥有良好的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的（智慧）城市也一定是可持续的”^[22]。

但是，我们是何时、以何种方法、依据何种证据得到了这一“公认的真理”，即“智慧”城市等于“可持续”或“公平”城市？上面的引用表明，我们已经把自己创造的神话当作真理。因为我们在没有证据表明的情境下就将我们的工作假设直接视为“真理”，我们已经将“智慧”与“可持续”画上等号。简而言之，我们一直在做糟糕的科学。因此，当数据收集及监控的“智能化”成为一个目标本身以及城市设定发展框架的前提，关键的问题是《新城市议程》以及可持续发展目

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中对城市的日益关注^[23], 能否改变这种简单且逻辑上存在缺陷的辩论和实践?

2 《新城市议程》: 改变“什么”(What) 而没有改变“方式”(How)

联合国住房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大会 (人居三大会) 的《新城市议程》和 2016—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目标 11 “可持续城市和社区” (sustainable cities and communities)^[3], 都被誉为是对城市学者一直系统地争论和记录的问题的一种认可——即我们必须解决城市化进程, 才能解决全球社会—环境问题^[24]。数十年来城市研究的核心问题 (如住房、城市交通、卫生、空气质量检测、废物管理、文化及自然城市遗产等), 最终以某种方式被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中, 即“建设包容、安全、韧性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4]。这一目标在《新城市议程》中也同样被提及^[25]。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 当涉及需要改变“什么”(what) 时 (如 Barnett 和 Parnell 的讨论^[26]), 《新城市议程》的确扩展了概念框架。因为它认识到城市不仅是问题, 也是推动具有广泛深远影响的政策变革的机会^[27]。但是, 尽管城市是“什么”以及该语境下可持续发展意味着“什么”发生了概念上的转变, 但在“方式”(how) 方面, 《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使城市“安全、韧性、可持续和包容”) 的呼声似乎已经被过去相同的研究议程、相同的政策和框架所挟持。尽管《新城市议程基多执行计划》 (“Quito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the New Urban Agenda”) 称赞了新的“城市范式转变”^[28-29], 但像城市繁荣倡议 (City Prosperity Initiative) 之类过去效率有问题的方法已在人居三大会上重新启用, 并且正在进行“修订和测试……以适应《新城市议程》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目标”。人居三大会致力于在过去 (失败的) 方法的基础上, 通过进一步加强“系统地监测和报告”, 建立更复杂和“定制的监测机制”, 以衡量“《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30]。“获取科学、技术、创新和不断增强的知识共享”再次成为《新城市议程》的重点^{[25]17}, “智慧”城市框架比

“可持续”城市更为重要 (尽管现在也包括“韧性”“包容”和“安全”城市)。可以预见的是, 《新城市议程》提出的政策和研究议程同样依赖于旧的 (曾经尝试过但经常失败的) 路径, 因为它们仍旧专注于同一组问题:

1) 我们该如何为最佳的指标构建模型, 在监控“可持续性”的同时监控“包容性”“安全性”“韧性”?

2) 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利用大数据, 找到最智能的技术来收集数据, 为我们优化的、永远需要大量数据的建模做准备?

3) 我们应该寻找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解决方案?

4) 我们应该信任市场 (的效率和有效性) 还是相信人民 (的非理性选择、问责制和包容性)?

因此, 尽管《新城市议程》改变了人们理解的城市概念框架 (conceptual framework), 但关键的研究和政治“问题”仍然是相同的。方法论工具 (methodological tools) 和体制框架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将城市视为一种过程, 并将资源、人、环境、商品和服务的流动视为机遇而不是难题^[26], 但提出的关键问题以及方法论工具和体制框架迄今仍然没有改变。

使用这些失败框架很难让人相信《新城市议程》能从根源解决问题。这样做就必须认识到, 一个地区的可持续性可能会导致另一地区的社会—环境破坏; 在布鲁塞尔成功安装智能监测技术, 很可能意味着对刚果社会—环境的进一步破坏; 伦敦电子产品回收的成功很可能意味着向印度出口危险电子废物的增加。

现如今, 我们可以总结我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政策和研究实验方面的重要经验, 也意识到追求一套完美的可持续性指标和技术管理解决方案来抵消全球城市社会—环境问题的陷阱。我们还坚持认为社会—环境平等可以简化为包容性指标吗? 社会福利可以简化为韧性和安全性指标? 或是环境保护可以简化为可持续性指标?

3 可持续发展时代的到来: 无知的终结

如前所述, 我们现在有足够的文件证

明, 继 1987 年《布伦特兰报告》 (Brundtland Report) 令人兴奋和乐观之余所进行的政策、体制和技术试验, 并未实现该报告所构想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已经证明, 追求一套完美的可持续性指标以及技术管理解决方案来监测这些指标, 并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缓解全球社会—环境的问题。我们还目睹了以“理性选择”为主导、以市场为导向的做法对社会—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大规模私有化计划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完善的基础设施、被毁的传统的供水网络以及耗尽的公共资金^[31]。这些计划甚至失败到使世界银行 (World Bank) 成立了一个检查小组, 对那些世界银行自己资助的而产生了负面影响的项目追究责任^[32]。同时, 我们对以下现象进行了查证、研究和归档。当通过放宽信贷途径 (私人贷款和抵押贷款) 来获得更好的住房教育或医疗卫生服务, 从而将社会福利变成私有服务时^[33], 就会导致一系列社会—环境灾难, 这其中包括欧美的次贷危机和访客被驱逐危机 (evictions crisis)^[34-35]。

对这些失败案例的大量解读可能会为这些过去的做法贴上“faux frais” (意外开支) 的标签; 那些早期的方法、政策和技术框架被认为是实验阶段或新生事物所附带的天真或无知的托词。那时我们还不知道, 但我们现在知道得更多了。可持续发展已经成熟。过去的方法和政策工具是“新事物”所附带的托词已走到尽头。过去的失败使我们更加精明、更有见识。它们还应该使我们变得足够明智, 而不再声称可以将全球社会—环境平等、社会福利或价值创造简化为指标。

那么, 为什么尽管我们非常清楚政策、经济、体制和技术管理框架已被证明行不通, 却仍要从同一个旧题材中选择我们的政策、治理和研究工具? 为什么尽管知道由技术管理解决方案驱动的议程是行不通的, 却仍在继续追求它们? 为什么尽管知道以市场为导向的解决方案不能像“一刀切”的灵丹妙药一样起作用, 却仍在倡导它们是最有效的方法^[36]? 这难道不是我们提出不同想法的时候吗? 是时候改变问题和方法了? 但是, 也许最重要的是, 现在是我们更换对话者的时候了。

4 更换对话者？日益不平等的世界中“异议”和假定平等立场的政策相关性

现如今以无知为借口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不能（在社会或环境方面）继续保持对失败的方法和政策框架的路径依赖。那么，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过去的失败会怎么样？如果我们既不是继续追求路径依赖，也不是继续通过设计指标和智能监控解决方案来追求“安全、可持续、韧性和包容的城市”，而是试图摆脱固有的政策路径，会怎么样？如果在改变我们理解的城市概念框架的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研究问题、方法论工具和体制框架，会怎么样？

但是，为了改变工具、方法和问题，我们需要更换对话者^[37]。我们需要集中关注“谁”（who）在过去的可持续发展议程和目标的设计实施过程中被压制了，以及“为什么”（why）。我们需要打破固有观念，不只是听取并参与通常怀疑导致城市环境变化的问题；且不只局限于邀请顾问、规划师、设计师、政策制定者、市场倡导者、技术专家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对话。

因此，与其尝试在普通利益相关者和受邀参与者之间就《新城市议程》建立共识（consensus），不如将注意力集中在监控“异议”（dissensus）上。试想一下将注意力集中在哪、如何、为什么以及由谁引起了冲突（conflict）和分歧。试想一下，不再忽略那些持异议的做法所引发的新研究和新政策问题。正如以下各节中所述，如果我们这样做，可能会发现韧性、安全性、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并不是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4.1 超越韧性

《新城市议程》和人居三大会议非常重视韧性，主张引导人力资源、研究经费与政策创新，以获取那些难以确定并能够完善我们韧性城市模型所缺少的参数。但是相反，我们可能会转移注意力，认真对待路易斯安那州司法研究所（Louisiana Justice Institute）所长特拉西·华盛顿（Tracie Washington）的发言。她要求政策制定者和媒体停止称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和英国石油（BP）漏油事件的受害者为“有韧性的”。“别再叫我有

韧性了”（stop calling me resilient）是她发起的一次响亮呼吁的公众运动，并在新奥尔良广泛传播。反对媒体和政策制定者一直称赞她的社区具有韧性，华盛顿解释说：“每次您说：‘哦，他们很有韧性’，（实际上）意味着您可以做更多事情，（一些）对（我的社区）来说是新的事情……我们并非天生具有韧性；我们在特定条件下具有韧性，但我并不想变得有韧性……（我想）解决那些（一开始）使我们（需要）具有韧性的事物。”^[38]

确实，华盛顿反对被称为“韧性”的说法直接表明了当前韧性的定义和实践。例如，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与奥雅纳咨询公司（Arup）合作推出的城市韧性指标体系（City Resilience Index），将城市韧性定义为“城市运转的能力，使在城市中生活与工作的人们（尤其是贫困和弱势群体），无论遇到任何压力或冲击依然可以生存及发展”^[39]。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特拉西·华盛顿的反对意见，那么我们将不再关注如何使公民“无论面临何种压力或冲击”时都更具有韧性，因为这仅意味着他们将来会承受更多的苦难、剥夺或环境退化风险。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一发言，我们则需要把重点放在确定从一开始产生增强韧性“需求”（need）的行为者和过程上，我们将尝试改变这些因素。

近年来，越来越多关于韧性的重要学术和政策研究表明，有必要将社会过程（包括社区、领导、社会学习、网络、机构等的复杂作用）纳入未来的方法设计和政策实践中以建立韧性^[40-54]。这一研究体系带来了重要的批判性见解；同时也引发了更广泛的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完全模拟全球社会—生态变化，并通过技术专家的解决方案来实现社会—环境正义。但是，当前《新城市议程》中的韧性建设框架仍然没有关注这些更广泛和更关键的问题。

4.2 超越包容性

与《新城市议程》中处理“韧性城市”相似的手段、方法和框架，也适用于处理“包容”“安全”和“可持续”城市。2015年8月，联合国大会发布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紧接着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跨机构专家组（Interagency and Expert Group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Indicators, IAEG-SDGIs）通过了授权并制定了一项“全球指标框架”（global indicator framework），旨在“以平衡和综合的方式涵盖所有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28-29]。

全球指标框架于2016年3月获得通过。这意味着，甚至在人居三大会议讨论的《新城市议程》草案（2016年9月10日）发布之前^[28-29]，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法框架和政策工具就已经在先前的政策和方法路径的基础上确定了。确实，2016年3月在纽约举行的统计委员会（Statistical Commission）会议上，不同的团体^[55]对推动制定“新”指标框架的参数和流程提出了质疑。然而，采用基于指标框架的方法作为实现2016—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最佳手段，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但很少有人提出异议或进行更广泛的辩论。甚至在随后的公开协商期（2016年9月19—28日），其主要内容即邀请各方就“可持续发展目标全球指标框架中有限指标的改进”提出建议，也是一样^[56]。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越来越多的公民和社区拒绝仅仅是“被纳入”（included）预定义的政策框架中，并拒绝参与实现“包容性”指标，而不是仅要求对话者完善通常的“包容性”“安全性”“可持续性”或“韧性”指标，那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罗马尼亚露西亚蒙塔纳（Rosia Montana）的罗西尼（Rosieni）社区的行动——拒绝参加关于如何使破坏环境和生计的新采矿项目变得更“可持续”和更“有益”的讨论，会怎么样呢？实际上，罗西尼社区确实接受了最初的邀请，与矿业公司和州政府当局坐在谈判桌旁。但是他们很快意识到，这只是使现有不公正做法合法化，并被动确立了角色和权力立场。当应邀“被纳入”时，他们已经被赋予了明确的角色：在制定发展目标和分配资源时，已经不是平等的共同决策制定者角色，而是从属角色，后者只能从金钱或其他补偿性做法中换取作为破坏他们生计和环境的回报^[57]。

或者，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了西班牙受灾人口平台 PAH（类似罗西尼社区）的做法：坚决不接受“被纳入”在预先设计的政策框架，而非仅追求将完美的“包容性”指标添加到寻求完美的“可持续性”指标的方法中，这将会发生什么？PAH 成立于 2009 年，目的是支持西班牙因无法偿还抵押贷款而被逐出的家庭（目前有 30 万户以上）^[59]。PAH 不接受国家或银行作为强权角色而有权驱散公民，然后又将被驱逐的公民“纳入”住房讨论。相反，PAH 将住房确定为所有人无可争辩的权利。它认为，如果不授予这项权利，就不应通过建立共识的框架进行谈判，这是务必要采取的措施。

PAH 以 3 种不同方式为被驱逐的人收回了这项权利：1）通过法律手段制止驱逐，从而使驱逐成为国家和银行需要付出高昂代价的行为；2）通过在驱逐过程现场中，由公民（当事人）在场参与并构成强烈的身体对抗；3）通过占领银行拥有的空楼来安置被驱逐家庭。简而言之，PAH 积极推动了一个进程，使那些被驱逐者成为被关注的政治群体，不仅得到安置，而且重获尊严。

4.3 超越错误可持续性困境（市场 VS 公共管理）

最后，如果我们考虑将关于可持续性的辩论和政策议程，从一直以来市场效率和公共问责制的错误二分法中剥离出来，结果会怎么样？我们应该认真对待 Patel 等^[59]关于孟买印度联盟（Indian Alliance）方法的论文，该联盟 30 多年来一直在发展社区实践，以提供政府和市场机制之外运作的住房供应。

或者，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希腊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的 136 倡议运动（K136）、“SOSte to NERO”联盟以及其他民众组织所提出的，将水重新定义为公众资源（the commons），而不是公有或者私有的。作为对私有化号召的回应，公共水务公司工会提出了新的设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协商将水作为共享资源和人权的框架。K136 不是简单地即将进行的水务公司私有化提出抗议，而是制定了一些做法和手段，让市民买下水务公司，并使其在私有化时成为民众组织。“136”

实际上是指每个市民为了实现竞标所缴纳的欧元数额。他们的口号是“付出 136 欧（约 1 050 元人民币）一次买回公共权益”（Buying back the public, 136 euros at a time）。

在这种情况下，最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呼吁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呼吁一样成为乌托邦式的愿景。公民联盟确实筹集了资金，并参与了 2013 年塞萨洛尼基水务公司收购的公开竞标，与苏伊士水务（Suez Water）和以色列国家水务公司（Merkorot）等全球企业巨头同台竞争。K136 在金融家罗伯特·阿普菲尔（Robert Apfel）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私有化运动（Margaret Thatcher's privatization programme）的前顾问乔恩·雷德伍德（Jon Redwood）的帮助下，说服了 20 个国际投资者（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一家法国合作银行和意大利的银行）以 10 亿欧元（约 80 亿人民币）担保他们的投标。这样一来，K136 给每个公民带来了深刻的政治选择。是留着 136 欧元用来购买 10 件衣服、5 双鞋、一部智能手机等，还是将其变成实际资本。也就是说，他们有能力决定城市水资源的使用、管理和分配。

尽管他们的出价被希腊共和国资产发展基金 S.A.（TAYPIEDA）裁定为“非法”，但公民水联盟通过将此决议告上法庭而停止了投标过程，并在国际公投后阻止了市政水务公司的私有化。这场与水资源相关的公民运动（K136、SOSte to NERO 及相关非政府组织联盟）之所以如此激进，是因为他们将公民从无权的受“恩惠”对象转变为潜在的决策者，他们可以通过提出分配和管理资源的替代性手段来收回自己的公众资源。

5 《新城市议程》充当免疫角色：如果社区拒绝接种“疫苗”怎么办？

上文中描述的示例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纷争的一部分，也就是全世界各地泛滥的有争议、不满和分歧的做法。这些做法的共同点是，它们明确指出了将韧性、安全、包容和可持续等概念作为发展目标和实现全球社会—环境平等手段的误区。即，这 4 个概念都只具有分配或传递的属性：从当权者到达需要者。因此，它们无法（通过设计）解决与

先决条件相关的问题，即使人和环境一开始必须寻求韧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这些实践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充当免疫角色^[59-60]：它们为人和环境都接种“疫苗”，以便他们将来能够承受更大剂量的不平等和环境退化风险。追求这些目标也许可以调和全球社会—环境不平等的某些后果。但这对缓解不平等本身没有什么作用。

迄今为止，这种免疫学实践正是我们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它们是生态现代化的本质，但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通过指标和智能技术来追求目标有时可能有助于抵消全球社会—环境不平等的某些影响，但不能为当地或全球社会—环境问题提供长期解决方案。

因此，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公民和社区拒绝参加“免疫实践”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拒绝被打造得韧性、包容、安全或可持续。他们拒绝参与监控活动。相反，他们要求平等，并且创造平等。之前提到的实践和方法的共同点是，它们在使社区安全、韧性、可持续或包容方面建立了新的“方式”（hows）。所涉及的人员拒绝“被纳入”，因为他们有更多要求。他们要求在制定发展目标以及改变体制实践和框架方面成为共同决策者，并且他们会根据这一要求采取行动。他们建立了替代性的实践和方法，以及替代性的“方式”。他们通过在日益不平等的世界中假定处于平等立场来做到这一点^[61-64]。

当特拉西·华盛顿在新奥尔良各地宣传“不要叫我有韧性！”时，她明确声明她（及其社区）不准备接受这种方式的进一步免疫。他们要求成为决策的一部分，从而改变那些从一开始就需要建立韧性的做法。当希腊水联盟发言人之一乔治·阿康托普洛斯（George Archontopoulos，公共水务公司工会代表）向苏伊士水务首席执行官（塞萨洛尼基水务公司的竞标者）赠送了一件印有水联盟反私有化口号的 T 恤时，他表示她能从希腊得到的只有那件 T 恤，但他的行为超越了作为公共水务公司员工的普通存在。在这一行动中，当面对全球最强大的水务公司之一的首席执行官时，他构建了平等的立场，因为他假定了这种平等。他和他的同事以及更广大公民联盟没有

坐下来讨论如何“韧性”地面对私有化后可能出现的裁员和减薪，而是将水权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不再仅是追求韧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

6 寻找“真正的”智慧城市：将“异议”作为活指标

“有哪个社会死于异议吗？而我们所经历过的，却有几个死于因循守旧。^[65]”

上述提到的运动和发起者只是世界上的一小部分，他们创立了打破先前从属地位和做法的新方法^[66]。他们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不符合现有的议程和辩论，因为这些议程和辩论主要是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设计或管理和监测技术。但是，如果我们正在寻找“真正的”智能解决方案和“真正的”社会革新，那么它们就是这些运动所采用的方法、实践和叙述，以及它们创立的管理共享资源的替代性方式^[67]。

随着替代性实践和方法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人们拒绝采用预先规定的开发实践或预先确定的免疫方案。现在已是成熟而适当的时机，更多关注来自社会“异议”（例如对普遍存在做法的异议）的社会—环境创新和方法，而不是社会共识。

与那些基于资金充裕的框架、在普通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共识而形成的方法不同，从“异议”中形成的方法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并且在需求迫切以至于公民为了可以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被迫承担起新的角色时出现。因此，这些有关“异议”的事例和做法有可能充当活指标（living indicators），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方向的指南针。潜在的，从“异议”中形成的方法可以推动构建解决全球社会—环境不平等问题的替代性手段。这些人与环境的共同存在和共同运转的新兴构想，可能提供比任何一套指标或技术管理解决方案都更直接、有效的方式，来解决城市人居环境中关于获得住房、医疗、教育、水资源和良好空气质量的问题。

由于不断强调数据收集以及“需要系统地监测和报告《新城市议程》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标”，以便“做出更明智的决策”^[68]，

提出不同问题已开始成为一种学术、政治和社会环境领域的责任。系统地监测、记录 and 评估“异议”驱动的实践和方法已成为一种政治紧迫性。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些实践，如果我们使用这些活指标和方法，我们可能会超越陈旧的指标框架和免疫实践，而向紧迫性驱动的全球社会—环境平等框架迈进。我们也许且很可能会再次失败，但至少我们尝试过更好地失败。

（本文英文最初发表于：Kaika, Maria. 'Don't call me resilient again!': the New Urban Agenda as immunology ... or ... what happens when communities refuse to be vaccinated with 'smart cities' and indicators[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7, 29(1): 89-102.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epub/10.1177/0956247816684763>）

致谢 (Acknowledgments):

非常感谢 ENTITLE 所有的导师和研究员推动政治生态议程向前发展。非常感谢 Luca Bertolini、Federico Savini、Hebe Verrest Stefan Bouzarovski、Saska Petrova、Grigoris Kafkalas、Nicos Komninos、Erik Swyngedouw，以及 David Satterthwaite、Sheridan Bartlett、Christine Ro，和 3 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有益建议，如提醒我注意到印度总理莫迪的智慧城市案例。

注释 (Notes):

- ① FG-SSG 是联合国的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ITU-T) 的焦点小组，其主要从事信息通信技术的研究。
- ② 以城市作为关注焦点的目标 11 (“建设包容、安全、韧性及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被列入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成果文件中，题为《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该文件作为参考文献 [23] 的附件，经 2015 年 8 月 2 日联合国全体会议非正式会议协商一致通过。
- ③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post2015/transformingourworld>。
- ④ 见注释 ③ 和 <https://sustainabledevelopment.un.org/?menu=1300#>。
- ⑤ 会议于 2016 年 3 月 8—11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见参考文献 [28-29]。
- ⑥ Muchhala 报告说，以孟加拉国为代表的最不发达国家集团 (LDCs Group) 于 2016 年提出了 (其中一个) 问题“指标 17.8.1 (个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因为它“没有实现目标 17.8”，即“到 2017 年全面实施最不发达国家的技术银行 (technology bank) 及科学、技术与创新能力建设机制，并增强对赋能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使用”。据报道，以泰国为代表的由 134 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77 国集团 + 中国” (G77 and China group) 强调，“各项指标应忠于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应重新诠释其目标”。以荷

兰为代表的欧洲联盟强调了“方法上的进步与国际可比性”以及“将指标纳入技术领域的重要性”。见参考文献 [55]。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1] Dutch Air Quality Breaks EU Standards in Some Cities[N/OL]. Dutch News, 2016-05-11[2016-05-11]. <http://www.dutchnews.nl/news/archives/2016/05/dutch-air-quality-breaks-eustandards-in-some-cities/>.
- [2] PERRY F. Can 'Smart' Birdhouses Help Improve Air Quality in Amsterdam?[N/OL]. The Guardian, 2016-06-10[2016-11-07]. <https://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jun/10/city-links-smart-birdhouses-improve-airquality-amsterdam>.
- [3]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dicators to Monitor Global Targets of the Sendai Framework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2015—2030: A Technical Review[R/OL]. (2015-07-29). https://www.preventionweb.net/files/45466_indicatorspaperaugust2015final.pdf.
- [4] DI BELLA A, RUGGIERO L. Néolibéralisme et Développement Urbain dans L'Italie du Sud: le Modèle «IBM Smart City» dans la Ville de Syracuse[M]// Penser la Fabrique de la Ville en Temps de Crise(s). Construction Politique et Sociale des Territoires Cahier No. 5. Tours: Citeres, CNRS-Université de Tours, 2016: 66.
- [5]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Condemns Illegal Exploitation of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s Natural Resources[EB/OL]. (2001-05-03). <https://www.un.org/press/en/2001/sc7057.doc.htm>.
- [6] YIGITCANLAR T, SANG H L. Korean Ubiquitous-Eco-City: A Smart-Sustainable Urban Form or a Branding Hoax?[J].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2014, 89: 100-114.
- [7] PIETERSE E. Recasting Urban Sustainability in the South[J]. *Development*, 2011, 54(3): 309-316.
- [8] MARTINEZ-ALIER J. Environmental Justice (Local and Global)[J].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997, 8(1): 91-107.
- [9] DOOLING S. Ecological Gentrification: A Research Agenda Exploring Justice in the C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9, 33(3): 621-639.
- [10] CUGURULLO F. Urban Eco-modernisation and the Policy Context of New Eco-city Projects: Where Masdar City Fails and Why[J]. *Urban Studies*, 2016, 53(11): 2417-2433.
- [11] Amnesty International. United Arab Emirates Annual Report 2015/16: Migrant Workers' Rights[EB/OL]. (2016). <https://www.amnesty.org/en/countries/middle-east-and-north-africa/united-arab-emirates/report-united-arab-emirates/>.
- [12] DATTA A. New Urban Utopias of Postcolonial India: 'Entrepreneurial Urbanization' in Dholera Smart City, Gujarat[J].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15, 5(1): 3-22.
- [13] GREENFIELD A. Zeroville-on-Khambhat, or: The Clean Slate's Cost[J].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15, 5(1): 40-44.
- [14] HARRIS A. Smart Ventures in Modi's Urban India[J].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2015, 5(1): 23-26.
- [15] HOELSCHER K. The Evolution of the Smart Cities Agenda in India[J]. *International Area Studies Review*, 2016, 19(1): 28-44.

- [16] GREENBERG M. Whose Ecotopia? The Challenge of Equity in Urban Sustainability Planning[M]//SZE J. Situating Sustainability: Sciences/Humanities/Societies, Scales, and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6.
- [17] WALKER R. The Country in the City: The Greening of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 [18] BOUZAROVSKI S, FRANKOWSKI J. Low-Carbon Gentrification: When Climate Change Encounters Residential Displace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16, 42(5): 845-863.
- [19] HEYNEN N, PERKINS H A, ROY P.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Uneven Urban Green Space[J]. Urban Affairs Review, 2006, 42(1): 3-25.
- [20] KOMNINOS N. The Age of Intelligent Cities: Smart Environments and Innovation-for-All Strategies[M]. London: Routledge, 2015: 278, xvi.
- [21] KAIKA M, SWYNGEDOUW E. The Urbanization of Nature: Great Promises, Impasse, and New Beginnings[M]// BRIDGE G, WATSON S. The New Blackwell Companion to the City. Oxford: Blackwell, 2011: 96-107.
- [22] ARAÑA S G, MENON M. Smart Sustainable Cities: A Guide for City Leaders[R]. Geneva: ITU-T Focus Group, 2015: 9.
- [23]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Draft Outcome Document of the United Nations Summit for the Adoption of the Post 2015 Development Agenda: A/69/L.85[R]. New York: UN, 2015: 2-35.
- [24] KEIL Roger. Los Angeles: Globalization, Urbanization, and Social Struggles[M].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Ltd., 1998.
- [25]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ousing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Habitat III). Adopted Draft of the New Urban Agenda, Quito[RO/OL]. (2016-10-20) [2016-11-21]. https://www2.habitat3.org/bitcache/99_d99fb0824de50214e99f864459d8081a9be00?v_id=591155&disposition=inline&op=view.
- [26] BARNETT C, PARNELL S. Ideas, Implementation and Indicators: Epistemologies of the Post-2015 Urban Agenda[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6, 28(1): 87-98.
- [27] BUCKLEY R M, SIMET L. An Agenda for Habitat III: Urban Perestroika[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6, 28(1): 64-76.
- [28]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port of the Inter Agency and Expert Group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Indicators[RO/OL]. (2016-03-11)[2016-10-20]. <http://unstats.un.org/unsd/statcom/47th-session/documents/2016-2-sdgs-rev1-e.pdf>.
- [29]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Report on the Forty-Seventh Session (8-11 March 2016)[R]. New York: 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 Official Records 2016 Supplement No. 4, Statistical Commission, 2016.
- [30] Habitat III Programme. Measuring the New Urban Agenda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City Prosperity Initiative[EB/OL]. (2016-10-18)[2016-10-21]. <https://habitat3.org/programme/measuring-the-new-urban-agenda-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the-city-prosperity-initiative/>.
- [31] HALL D, LOBINA E, DE LA MOTTE R. Public Resistance to Privatisation in Water and Energy[J].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2005, 15(3/4): 286-301.
- [32] WOLLMANN H, MARCOU G.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Services in Europe: Between State, Local Government and Market[M].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0.
- [33] CROUCH C. Privatised Keynesianism: An Unacknowledged Policy Regime[J].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9, 11(3): 382-399.
- [34] DESMOND M. Eviction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Povert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12, 118(1): 88-133.
- [35] GARCÍA-LAMARCA M, KAIKA M. "Mortgaged Lives": The Biopolitics of Debt and Housing Financialisation[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6, 41(3): 313-327.
- [36] SATTERTHWAITHE D. A New Urban Agenda?[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6, 28(1): 3-12.
- [37] KAIKA M. The Water Framework Directive: A New Directive for a Changing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uropean Framework[J].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2003, 11(3): 303-320.
- [38] FELDMAN J. MSNBC Guest: Stop Using the Word 'Resilient' to Describe Katrina Victims[EB/OL]. (2015-08-29). <http://www.mediaite.com/tv/msnbc-guest-stop-using-the-word-resilient-to-describe-katrina-victims/>.
- [39] Arup an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ity Resilience Index, City Resilience Framework[M]. London: Ove Arup & Partners International Limited, 2014: 3.
- [40] MANYENA S B.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Revisited[J]. Disasters, 2006, 30(4): 433-450.
- [41] BOUZAROVSKI S, SALUKVADZE J, GENTILE M. A Socially Resilient Urban Transition? The Contested Landscapes of Apartment Building Extensions in Two Post-Communist Cities[J]. Urban Studies, 2011, 48(13): 2689-2714.
- [42] FOLKE C. Resilience: The Emergence of a Perspective for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e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3): 253-267.
- [43] OLSSON P, GALAZ V, BOONSTRA W J. Sustainability Transformations: A Resilience Perspective[J]. Ecology and Society, 2014, 19(4): 1.
- [44] PETROVA S. Communities in Transition: Protected Nature and Local People in Eastern and Central Europe[M]. Aldershot: Ashgate, 2014.
- [45] JOHNSON C, BLACKBURN S. Advocacy for Urban Resilience: UNISDR's Making Cities Resilient Campaign[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4, 26(1): 29-52.
- [46] ODEMERHO F O. Building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 Through Bottom-Up Adaptation to Flood Risk in Warri, Nigeria[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5, 27(1): 139-160.
- [47] GUNDERSON L H, HOLLING C S. Panarchy: Understanding Transformations in Human and Natural Systems[M].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2.
- [48] PELLING M.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From Resilience to Transformation[M]. London: Routledge, 2011.
- [49] BROWN A, DAYAL A, DEL RIO C R.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Emerging Lessons from Asia for Building Urban Climate Change Resilience[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2, 24(2): 531-556.
- [50] SATTERTHWAITHE D, DODMAN D. Towards Resilience and Transformation for Cities Within a Finite Planet[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3, 25(2): 291-298.
- [51] ORACH K, SCHLÜTER M. Uncovering the Political Dimension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Contributions from Policy Process Framework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6, 40: 13-25.
- [52] LÓPEZ-MARRERO T, TSCHAKERT P.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Building More Resilient Communities in Flood-Prone Areas[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1, 23(1): 229-249.
- [53] SMIT B, WANDEL J. Adaptation, Adaptive Capacity and Vulnerability[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6, 16(3): 282-292.
- [54] ERNSTSON H. "Stop Calling Me RESILIENT", Comment on Tom Slater's Blog Post "The Resilience of Neoliberal Urbanism"[EB/OL]. (2014-02-05)[2017-01-31]. <http://www.rhizomia.net/2014/02/comment-on-tom-slaters-blog-post.html>.
- [55] MUCHHALA B. DG Indicators Challenged by Many UN Member States: TWN Info Service on Health Issues[EB/OL]. (2016-03-24)[2016-10-20]. <http://www.twn.my/title2/health.info/2016/hi160304.htm>.
- [56] IAEG-SDG. Open Consultation on Possible Refinements to the Global Indicator Framework[EB/OL]. (2016-09-28)[2016-10-19]. <http://unstats.un.org/sdgs/iaeg-sdgs/open-consultation-4/>.
- [57] VELICU I, KAIKA M. Undoing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imagining Equality in the Rosia Montana Anti-mining Movement[J/OL]. Geoforum, 2015. DOI: 10.1016/j.geoforum.2015.10.012.
- [58] PATEL S, ARPUTHAM J, BARTLETT S. We Beat the Path by Walking: How the Women of Mahila Milan in India Learned to Plan, Design, Finance and Build Housing[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6, 28(1): 223-240.
- [59] ESPOSITO R. Terms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ty, Immunity, Biopolitics[M].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2013.
- [60] SWYNGEDOUW E, ERNSTSON H. O Tempora O Mores! Interrupting the Anthro-ObScene[M]// SWYNGEDOUW E, ERNSTSON H. Urban Political Ecology in the Anthro-ObScene: Interruptions and Possibilities. Abing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25-47. DOI: 10.4324/9781315210537-2.
- [61] SWYNGEDOUW E. Interrogating Post-Democratization: Reclaiming Egalitarian Political Spaces[J]. Political Geography, 2011, 30(7): 270-280.
- [62] SWYNGEDOUW E. Where is the Political? Insurgent Mobilisations and the Incipient "Return of the Political"[J]. Space and Polity, 2014, 18(2): 122-136.
- [63] KAIKA M. The Economic Crisis Seen from the Everyday: Europe's Nouveau Poor and the Global Affective Implications of a 'Local' Debt Crisis[J]. City, 2012, 16(4): 422-430.
- [64] KAIKA M, KARALIOTAS L. The Spatializ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sights from Indignant Squares[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16, 23(4): 556-570.
- [65] BRONOWSKI J. Science and Human Values[M]. New York: Julian Messner, 1956.
- [66] RANCIÈRE J. La Méésentente: Politique et Philosophie[M]. Paris: Editions Gallilée, 1995.
- [67] WILSON D, KEIL R. The Real Creative Class[J].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y, 2008, 9(8): 841-847.

(编辑 / 王一兰)